



党在鄂东地区 革命斗争史资料(初稿)

内部资料不得外传

湖北省委党史调查组鄂东分組編

1960年3月

黨在鄂東地区革命斗争史資料(初稿)

編 者：湖北省委党史調查組鄂東分組

校對者：安 長 春 劉 毅

封 面：陳 詩 旋
設 計：

印刷者：武 漢 大 學 印 刷 廠

字 數：420,000字

編 者 說 明

本資料是在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的直接領導下，由武漢大學歷史系五位青年助教、研究生和十五位青年學生集體編寫而成的。

編寫本資料的目的，是供曾經參加和領導過這一地區革命鬥爭的主要負責同志審閱之用，並為中央編寫全國黨史和湖北編寫地方革命史提供參考資料。這是一本內部資料，不得遺失或外傳。

本資料按照省委的指示，企圖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通過歷史史實來說明黨是如何領導鄂東地區的革命鬥爭直至取得最後勝利的。為此，在編寫上以原始材料為主，並略加一些編者按語，為便於讀者辨認起見，在按語兩端各空出四字，以資區別。

本資料主要根據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文獻、鄂豫皖蘇區紅軍的戰史、戰報、“鄂東北革命根據地大事記”、“星火燎原”、領導同志的談話紀錄、“解放日報”、鄂東各縣的革命史資料匯編（初稿），以及其他有關書刊報紙等約七百萬字的材料選編而成。但這份資料仍然是很不完整的，有些問題材料不足，尤其是關於黨的組織活動、土地革命時期黨的正確路線如何與錯誤路線作鬥爭等等重要問題的材料非常缺少，尚有待於繼續搜集補充。

本資料選錄的材料，一般均照原文引用，若有明顯錯漏者，則根據其他材料予以訂正；有些原文過長或與問題無關者，則適當予以刪節；有些材料過於零散或內容重複者，則按原意加以綜合。凡選錄的材料均註明出處，綜合的材料出處在數個以上者，則只註明其中一兩個較重要的，其餘從略，如材料出處只寫“紅安”字樣者，系“紅安縣革命史資料匯編（初稿）”的簡稱，其他各縣依此類推。

本資料因倉促付印，未經統一主編，在內容上難免有重複、遺漏或不一致之處；在文字上，如年代的書寫，有的用中文有的用阿拉伯字；在格式上，如材料出處的說明、符號的使用也不完全一樣。諸如此類，請讀者注意和原諒。

由於我們理論水平低，沒有科學研究和編寫工作的經驗，其中大部分同志尚未學過中國革命史這門課程，更重要的是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來編寫地方革命史資料做得還不夠，因之缺點和錯誤一定不少，深望讀者予以指正。

湖北省委黨史調查組鄂東分組

（武漢大學歷史系鄂東革命史資料編寫組）

（一九六〇年三月）

目 录

第一編 黨的創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第一章 第一次國內革命战争前的鄂东社会經濟概况.....	(3)
第一节 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	
第二节 軍伐吳佩孚、肖跃南和豪紳統治下的鄂东政治	
第三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鄂东經濟	
第四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鄂东文化	
第二章 五四运动的影响，馬列主義的傳播，党組織在鄂东的建立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二四年)	(11)
第一节 五四运动的影响，馬列主义的傳播	
第二节 黃岡、黃陂、黃梅党的建立	
第三章 統一战綫的形成，革命运动的開展 (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九月)	(15)
第一节 鄂东各县党組織的相繼建立和初步发展	
第二节 鄂东各县革命統一战綫的初步形成	
第三节 党领导下革命运动的开展	
第四章 鄂东革命运动的猛烈高漲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九二七年五月)	(21)
第一节 北伐軍进军鄂东后，农协組織蓬勃发展	
第二节 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后鄂东农村大革命的猛烈高漲	
第五章 鄂东革命進入緊急阶段，革命的失敗 (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月)	(45)
第一节 夏斗寅叛軍竄扰鄂东，革命进入緊急阶段	
第二节 汪精卫集团叛变，鄂东革命运动的失敗	
第三节 第一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鄂东革命运动的經驗教訓 (小結)	

第二編 第二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七年十月)

第六章 党為建立農村革命根据地而斗争 (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〇年三月)	(53)
第一节 第一次國內革命战争失敗后鄂东地区的政治形势	
第二节 “八七”會議精神的貫徹，鄂东地区的秋收暴动，木兰山进军	
第三节 黃麻革命根据地的創立	
第四节 反“徐夏会剿”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巩固	
第七章 党為巩固和扩大苏維埃政权而斗争 (一九三〇年三月——一九三二年九月)	(78)
第一节 鄂豫皖特区的形成，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和苏区的扩大	
第二节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第三次反“圍剿”的偉大胜利	

第三节 土地革命的大开展，苏区的建设

第四节 鄂豫皖苏区红军和人民第四次反“围剿”的英勇斗争，张国焘路线指导下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八章 红四方面军西征后，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

(一九三二年十月——一九三七年十月)..... (147)

第一节 红卅五军保卫苏区的两年斗争

第二节 党领导下军民坚持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第三编 抗日战争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五年九月)

第九章 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一年一月)..... (171)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第二节 日寇入侵鄂东，党积极准备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第三节 鄂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

第十章 党为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一九四一年二月——一九四四年三月)..... (186)

第一节 抗日根据地困难局面的到来

第二节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第三节 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寇残酷进攻的英勇斗争

第四节 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附录：鄂东游击武装和民兵的对敌斗争

第十一章 党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一九四四年四月——一九四五年九月)..... (223)

第一节 局部反攻的发动和根据地的大发展

第二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和鄂东抗日武装为解放沦陷区人民而斗争

第四编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九年五月)

第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鄂东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六年五月)..... (230)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鄂东地区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第二节 党领导鄂东人民进行五个月的反内战斗争

第三节 停战协定生效后，我军在宣化店集结待命。国民党继续进犯。国共双方相继签订“罗山协议”、“应山协议”和“汉口协议”

第十三章 党领导鄂东军民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而斗争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九四七年七月)..... (243)

第一节 粉碎国民党匪军对中原解放军的“围歼”，中原部队胜利突围

第二节 中原主力突围后，党领导鄂东军民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十四章 鄂东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鄂东全境的最后解放而斗争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九四九年五月)..... (254)

第一节 刘邓大军反攻南下，鄂东地区革命再度高涨，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

第二节 鄂东军民胜利地坚持斗争，实现全境解放

第 一 篇

党的創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第一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的鄂东社会经济概况

第 節 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

这里所泛指鄂东，是今湖北省东部的红安（黄安）、麻城、大悟、孝感、黄陂、新州（当时属黄冈）、黄冈、浠水、罗田、英山、圻春、广济、黄梅十三个县，即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湖北省部分（其中英山县曾属安徽省；黄梅白湖渡以南地区曾属江西省所辖）。它位于大别山主峰以南，长江之北。其北有大悟、红安、麻城与河南交界；其东有罗田、英山、圻春、黄梅与安徽相毗邻，其南则有广济、黄梅与江西的瑞昌、九江隔江相望。

按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低。东北都有千山万壑纵横盘结的大别山脉，其中有木兰山、天台山、万紫山、大雾山、大悟山、桐山、古角等大山；西边有纵贯大悟、孝感、黄陂的京汉铁路；南有横经新州、黄冈、浠水、圻春、广济、黄梅的南北天堑——长江。从战略上说，除有形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大别山外，而且还可以控制京汉铁路和长江的交通运输，形成钳制武汉的形势。

交通运输：水路除长江外，尚有沅水、浉水、倒水、举水、巴水、浠水、圻水等河流和星罗棋布的湖泊。陆路除京汉铁路外，各县间均有公路相连接。

本地区，沿江有广阔的平原，并湖泊星布，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素称“鱼米之乡”。主要农产品有稻米、棉花、小麦、花生、苧麻等。山区丛林遍野，出产各种杂粮及菸、茶、桐油、木籽、竹木、药材等物产。西南部的江河湖泊地区，还盛产各种淡水鱼、藕、菱等。主要矿物则有铁、煤、硫磺、磷、石棉、云母等出产。

这里北部山高林密，金崖叠嶂，西南部沼泽四布，蔓草丛生，又物产丰富，有自足自给的经济条件，这就构成了坚持革命斗争的绝好场所。（据鄂东各县调查材料及有关县志综合）

第二节 军阀吴佩孚、肖耀南和豪绅统治下的鄂东政治

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肖耀南所统治下的鄂东政治是极端反动和腐朽的。广大劳动人民在其黑暗统治下毫无政治权利，没有半点民主自由。加上战乱频繁，捐税繁重，人民生活完全陷于绝境。各县的豪绅地主阶级更是依仗军阀势力称霸乡村，简直成了“乡里王”。鄂东人民在军阀和豪绅地主的联合统治下，完全成了任人宰割的“奴隶”。因此，推翻这些吃人的仇敌，彻底摧毁乡村的封建势力，成为鄂东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

一九二一年，湖北人民苦于北洋军阀的虐政，展开了驱逐督军王占元的自治运动。这年八月，吴佩孚借“援王”为名，进兵湖北，取王占元而代之。八月六日，北洋政府任吴为两

湖巡閱使，肖耀南为湖北督軍，从此，便开始了他們的黑暗統治。

在吳、肖統治下，連年軍閥混战，打張作霖、打四川、打福建、打湖南、打广东……弄得民穷財尽，民不聊生。集会、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无形中被剝夺了。軍閥和貪官污吏到处姦淫擄掠，无恶不作。加上外币充斥，物价飞騰，广大人民更加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各县的反动統治（俗称衙門）是軍閥政策的执行者，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县一級机关中設有知县、幫审、警察局、財务局等。此外，还有所謂“諮議局”（黃梅称“自治局”，黃陂称“行政會議”），这是土豪劣紳当权派所控制用来欺騙劳动人民的工具和把戏。人民諷之为“古董”和“妖魔鬼”。县下設区（黃梅称鎮，圻春称乡，离县較远之地还有什么“县佐”，罗田又称“奎”），区下設“会”，“会”下設保或村。这一套反动統治机构，特别是“会”之一級。完全为豪紳地主所占領。会首不仅是軍閥国家基层的官僚，同时又是族长和当地有名的大土豪劣紳。如黃安的諮議局长李介仁，既是会首又是族长，占田五千亩以上。他既是經濟上的剝削者，又是政治上和宗族內的統治者。“会”一級机关具有司法、行政和財政征收权（浠水專門設有“財政征收委员会”），那些活閻王随时可以对人民施行榨取、逮捕、監禁、审問和施以种种刑罰，成为无法无天的“土皇帝”。

在軍閥豪紳地主的联合統治下，鄂东农民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任何人不能說衙門半个不字。街談巷議亦受警察干涉，甚至走路也得讓路于富人，佃戶还要給地主磕头，称他們为“老爷”……农民簡直无人格可言。县里是“衙門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錢莫进来”。县以下更是官官相卫，同样是一鼻孔出气的“城狐社鼠”，所謂“朝里有人就有知事做，”农民要告状，首先要請他們喝酒，“有錢有理，无錢无理。”实际上，衙門是地主的衙門，农民弄得家破人亡，傾家蕩产，打官司也沒有說話的地方，就是理由十足也会变成十分无理的。那时有首民謠，真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富人真是很，袖里有衙門，穷人得罪他，累断脊樑筋”。农民完全处于被魚肉的地位。

封建宗法制度也是地主豪紳統治人民的重要手段。族长利用其政治經濟特权和宗族關係，掌握着乡村的一切大权。如黃梅的宗长有祭祀权、司法权、經濟权等等，甚至可以私立种种殘酷的家法和族規，如馱枷、打屁股、沉塘、活埋等，操縱了农民生杀予夺之权。宗族統治的經濟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除宗族內所有公产由族长支配外，他自己还占有几千担課的地产。宗族統治的政治靠山是軍閥和貪官污吏。如黃岡肖姓族长依靠的是軍閥头子肖耀南，这是一方面，另方面貪官污吏也得巴結当地土豪劣紳，如英山、黃陂等县的知事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訪当地大劣紳，还有重大事情还要請他們参加决定，否則，知事就会当不穩。总之，都是一丘之貉，狼狽为奸。族长还經常挑起宗族間的械斗，一方面用以勒索錢財，什么損失費，枪支費，另方面用以維護其封建的宗法統治，加强农民的宗族觀念，欺騙农民在“光宗耀祖，一致对外”的口号下，互相殘杀，心甘情愿地受其剝削和压迫，以實現用宗族矛盾掩盖階級矛盾，用宗族斗争掩盖階級斗争阴谋。械斗結果，双方地主同样握手言欢，而农民呢，累遭“卖妻鬻女，家破人亡”的慘禍。

軍閥、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除了加强其政治統治和精神統治外，还不断的加派各种苛捐杂稅，以滿足他們荒淫腐化的生活和逐年增加的軍費。他們不断加派軍餉，予征錢粮，发行金庫卷和增加稅額。如一九二四年发行金庫卷中規定，大县出五万，中县出三万，小县出一万。予征了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两年的地丁稅，取消了教育經費，加重了烟酒稅，实行

“盐斤加价”、“红契复验”，甚至连码头工人，也逃不脱他们的吃人的魔爪。苛捐杂税更加多如牛毛，什么人口税、户口税、牛头税、商税、田亩捐、皮花税……名目之多、不胜枚举。有一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穷人不得了，到处伸手要，卖儿和卖女，捐税不能少。”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就这样还填不满统治者的无底的卑鄙慾壑。

为了维护地主政权，各县各区还设有保卫团（黄冈称团练），这是地主阶级和贪官污吏用来勒索苛斂，捕捉农民的爪牙和走狗。但总的说来，当时地方的反动武装是薄弱的，人少分散（一般只二三十人），武器差（多是土枪和腰刀），尤其是英山、罗田、黄安、麻城等县，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加上离反动统治中心城市较远，极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以上综合自黄冈、黄陂、黄梅资料汇编）

綜上可見，“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来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军阀、封建地主、宗族制度三管齐下的结果，鄂东人民政治上完全无权，处于人间地狱的境地，必须起来挖掉这个“墙脚”，摧毁这个“基础”，才能得到彻底翻身，才能推翻人压迫人，人吃人的社会。

第三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鄂东经济

一、土地占有概况与封建剥削的残酷性、多样性：

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来源，可是在军伐统治下的鄂东，绝大部分的土地却集中在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手中，他们利用对土地的垄断，残酷地剥削广大的劳动人民。正是如此，所以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就成了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

在军阀吴佩孚统治时期，鄂东70—80%的土地，都被只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豪绅地主（包括祠堂）寺庙所占有，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贫、中农，却总共只占20—30%的土地，这种情况下表可以得到说明：

黄梅多云镇蒋家咀一九二四年以前的土地占有情况。如下表：

阶 级	户 数 及 百 分 比		占 有 土 地 及 百 分 比	
	户 数	百 分 比	占有田地亩数	百 分 比
地 主	6	7.31%	280亩	58.49%
富 农	2	2.43%	35亩	7.36%
中 农	7	8.53%	20亩	6.31%
贫 农	65	79.26%	30亩	6.31%
雇 农	2	2.43%		
祭 产 田*			100亩	21.52%
共 计	82		475亩	

(*祭产田即祠堂田，名义上同族共有，实际上是土豪劣紳所掌握，殘酷剝削农民)

当时鄂东到处都出現拥有万石以至数万石土地的大地主，如黃岡的大地主刘維真就占去二万五千石的田地，大地主方本仁占去一万二千石的田地，浠水何家寨的几姓祠堂就占有二万四千石的祭产田；黃安七里坪的龙潭寺也占去三千多亩的寺庙田，进行殘酷的收租剝削。

不仅一般的田地为豪紳地主所占去，就連公共的草地湖泊也被这些寄生虫霸去了，如黃梅的龙咸湖，桂西湖等，穷人在湖上打魚，还要向这些寄生虫繳納魚課；蔡山的一块大草地，农民在这块草地上放牛拾柴也要請豪紳地主喝酒。

在这种封建土地的占有状况下，使农民不得不租种豪紳地主所占去的土地，而忍受苛重的封建剝削。向地主租种土地一般分为批田、包种、帶田（各地的名称不同）等形式，所謂批田就是地主把田地分成田“底”和田“面”，貧苦农民要得到田面的使用权，就先要向地主交地价一半以上的押金（批礼，寄庄金），然后規定租額（不論年岁丰歉，都一样交租），如果农民交不清租課，地主就夺佃，押金就被地主吞了；分种（包种）是分成制，农民要以自己終年辛勤劳动所得收穫物的一半以上，甚至八成，交給地主，而且地主随时都可夺佃；帶田是低洼地区收穫沒有保障的田地，农民耕种如果有收穫的話，則50%以上的收穫被地主夺去。那时，大地主还往往把田地先租給小地主、富农，再由他們来租佃給农民，他們又从中榨取高額的地租。

农民除遭受高額的租課剝削外，而且还担负着殘酷沉重的額外剝削：农民除开始向地主批田时交大笔的押金外，而且三五年又需重加押金；此外，农民还要向地主做各种无偿的劳役，如黃陂县佃农每年要花十二天的工夫为地主修房子，六天工夫为地主抬轎，还要挑粪做杂工，佃农妇女要为地主做鞋、抱小孩、打零工、飼养牛馬；并且地主还露骨地用小亩出租（不到一亩的田以一亩計算出租），大秤大斗收租，如英山地主收租的秤，就是一斤等于二十两的，孝感地主收租課的斗，一斗要比一般的斗大四升；地主来收租时，佃戶要办課酒，年节要向地主送礼，如果农民一时送不出，也要送个条子計賬；还有无穷无尽的吸吮民血的課，佃戶家里出产什么，地主就要什么課，如麦課、棉花課、黃豆課、雞課、鴨課、魚課、木籽課、花生課、柴課……，当时英山县的农民就受着二十四种課的榨取。

異常沉重的地租以及无穷无尽的額外剝削，榨取得广大劳动人民穷困不堪，从而又加深了高利貸在农村的猖獗。

这时，鄂东高利貸的盘剝更加惊人，貧苦劳动人民向高利貸借錢，就要拿田地、房屋、家畜等家产抵押品，利息一般都是四、五分以上，甚至高利大加一、大加二、大加二五（即借一元月利一角、二角、二角五分）借期很短，通常都是一月为期，过了一月債主就把利息变成本錢（月月紅），利上滾利，滾到“儿子大过老子”，利息大于本錢（臭虫利），到期穷苦人还不起，債主就把抵押品夺去。如黃安福德乡的吳剛勤的二亩田和一条牛就是被高利貸者夺去的，秦錫兴被高利貸者逼得上吊自杀。

更殘酷的就是实物借貸，青黃不接时，农民向地主借一石谷（借青苗），到收割谷子后，就得还二石，甚至二石四斗，借四十斤紅苕皮，到割谷后就得还一石谷。同时高利貸者还放黃絲、油盐、柴……等实物来榨取人民的血汗。

和高利貸同时向农民敲骨吸髓的盘剝，就是當舖。穷人拿东西到當舖里去当，本可值五

元的東西，只給二元，又還要大加一、大加二的利息，由於往往窮人到期無錢去取東西，當的東西就變成“死當”，東西就被當舖奪去了。（以上綜合黃安、黃陂、黃梅等縣資料匯編）

殘酷的封建剝削，使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熱，朝不保夕的境地，使勞動人民完全失去了改進生產的能力。殘酷的封建剝削使勞動人民享受不到自己的勞動成果，嚴重地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就表明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推翻軍伐、豪紳地主的殘暴統治，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和鄂東勞動人民一致的要求。

二、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

帝國主義侵略者，利用種種不平等條約的特權，對鄂東大量傾銷商品，掠奪原料，殘酷地榨取人民的血汗，使鄂東農村經濟更普遍地日益遭到破產、解体。

十九世紀下半世紀以來，外國侵略者的勢力已侵入鄂東的黃岡、黃梅、廣濟、圻春、浠水和其他交通較方便的地區，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前，帝國主義的商品傾銷和搜刮原料已深入農村，甚至偏僻的山區。

帝國主義侵略者，通過各地的洋行、商行、代辦處大量傾銷洋布、洋油、紙烟、洋瓷器、洋火……。同時又通過它們大量搜刮鄂東的棉花、苧麻、桐油、烟葉、皮油（木籽油）、生漆、牛皮、豬鬃……。洋貨的傾銷，使不少的手工業遭到破產。如黃梅考田，過去不少農民自己種棉花、紡紗、織布，但洋布大量傾銷後，使織布的手工業遭到破產，洋布代替了土布。帝國主義搜刮原料的過程，就是殘酷榨取鄂東人民的過程，每當農產品上市的時候，洋人便通過代辦、商行壓價收購，這些侵略者把收購的原料加工後，又高價出賣來榨取人民，如九江的外國侵略者，每當黃梅的棉花上市時，便派人到黃梅來壓價收購棉花，他們把棉花運到九江加工後，又高價出賣。廣濟縣每當蕪上城的時候，日本人便通過當時的蕪行來賤價收購，使廣濟勞動人民吃虧不小。

同時，帝國主義者在鄂東各地還直接設碼頭和洋行，來剝削鄂東人民，如英帝國主義者在廣濟的武穴便設有“太古躉船公司”，日本人設有“大阪躉船公司”，在圻春日本侵略者設有“日清公司”，英帝設有“怡和公司”，在黃岡團風也設有“太古油公司”……等來直接傾銷商品搜刮原料，殘酷地榨取鄂東人民的血汗。（以上綜合自黃岡、黃梅、廣濟資料匯編）

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不僅直接榨取鄂東人民的血汗，而且由於洋貨奢侈品的侵入，使軍伐官僚、土豪劣紳、高利貸者的生活更加荒淫無恥，揮霍浪費，因此，這些寄生蟲就更殘酷地加重地租，提高利率，把更多的苛捐雜稅加在鄂東勞動人民的頭上，使勞動人民的生活更加悲慘。

三、工商業的狀況和商人、高利貸者、地主三位一體的剝削網：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的鄂東，因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制度的阻礙，尚無近代工業，只有一般規模狹小手工工場。同樣。商業資本也不能轉化為工業資本，而投資於土地和高利貸，形成商人、高利貸者，地主結合在一起，三位一體地盤剝廣大的勞動人民。

在軍閥統治時期的鄂東，還沒有近代的大工業，除少數縣（如孝感和廣濟的武穴）有電廠和碾米廠外，一般都只有手工打鐵、打銅、紡紗、織布、絲織、染布、軋面、油漆、陶器、造紙、竹器、木器等等手工工場。一般都是規模狹小、資本微弱，如黃陂的織布，建絨（絲織）等手工工廠，小廠只有兩三張機子，大廠也不過一二十張機子，幾十個工人。除這樣的手工工廠外，家庭手工業也還廣泛存在，如做篾貨、木貨、蠟燭、豆腐、麵條等等，產品有的自用，有的到市場上去出賣，換取油鹽、糧食等生活必需品。

當時鄂東商業發展情況也極不平衡，主要商業城鎮都在沿京漢鐵路和長江，如黃州、團風、孝感、武穴等，山區較落后。那時的商人也就是大地主，高利貸者，他們一方面和洋人相勾結，替洋人傾銷商品，搜刮原料，另方面又和軍閥、官僚及封建主義的錢莊、當舖相互勾結，進行投機取巧，囤積居奇來敲詐勒索人民，如黃梅菸葉上市時，商人便把三十多吊一担的菸葉壓低到二十一、二吊，農民賣了菸葉後，只能拿到幾吊現錢，其餘的便開個條子到錢莊去兌，可是錢莊的錢要到第二年二三月才能兌到，而且一吊錢只能兌到八百錢。在糧食上市時，商人便賤價收購，囤積起來，到青黃不接時，便高價出賣，從中榨取人民的血汗。（據黃陂等縣資料匯編綜合）

四、工農的悲慘生活和自發鬥爭：

在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軍閥官僚、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及殘酷的封建剝削下的鄂東人民，生活已處於水深火熱，朝不保夕的境地，加上頻繁的水旱天災和連年的兵禍，更使許多農民傾家蕩產，啼飢號寒，甚至被逼得上吊溺斃，流離失所。

當時，鄂東農民一年辛苦勞動，但到收割時除了交租付息所剩無幾。那時黃陂、麻城等縣的農民流傳着：“農民一年到頭忙，收了谷子滿稻場，揚叉掃帚一放下，還是落得精打光”的民謠，這就是當地地主殘酷掠奪農民勞動成果的真實寫照。由於豪紳地主的殘酷掠奪，使廣大的勞動人民過着飢寒交迫的生活。如英山的農民俗語叫“八月飽”，“二四八餐”，即是說農民在收割谷子時才能有幾餐飽飯吃，平常一天二餐，四天八餐，過着“糠菜半年糧”的生活，農民說“吃油是長齋，吃鹽是花齋”。黃岡的農民，糧食被地主奪走後，只能吃些小麥、大麥、蕎麥、高粱、小米、野菜、油樹皮、油樹葉、黃花菜、烏麻葉拌稀飯水。山區的農民，每年二月開始便上山挖葛根、削樹皮、找野菜來充飢，如果一遇上水旱天災，歉收年成，葛根、樹皮、野菜都吃光了，便只好吃觀音土，因吃了後不能消化，不少的農民便失去了生命。一九二五年，鄂東天大旱，“赤地千里，百草不結籽”，地主便把囤積的糧食大量往外運，謀取暴利，如孝感滑石沖、橋邊村姓石的幾家大地主，把糧食藏在倉里霉爛，倒到河裡去，不賣給農民吃，使老弱者多為餓死，活着的人有的淪為地主的長工，有的便只好組織“討米團”到外地逃荒，造成十室九空的淒涼景象。可是用人民血汗餵飽了的豪紳地主却囤積大批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糧食，過着花天酒地的可恥生活。

那時英山上水田地區流行着：“上水田，四面環山。山多田地少，窮人生活難。年年最怕秋收日，地主保證來逼捐。要盡黃金谷、逼盡賣兒錢，一家大小忍飢餓，哭望天涯淚不干。何時見蒼天？出盡萬重冤”的歌謠。這不僅是英山，而且是整個鄂東農民生活實況的寫照。

在封建統治者殘酷榨取下的鄂東農民，住的是草棚，甚至往往草棚都是向地主租來的。

冬天許多农民沒有棉被盖，沒有棉衣穿，如果有棉被棉袄的，也是几代相傳，破烂不堪，不能禦寒的。如黃安的吳家灣有四十多戶人家，沒有棉被盖的就有三十多戶，沒有棉衣穿的就更多了。因此，就只得烤火过冬，吳信香家里的小孩一个冻死，一个冻得麻木倒在火里燒死。英山的农民，热天也沒有衣洗換，只好晚上洗衣服，第二天才有穿。殘酷的封建剝削逼得广大劳动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了，如黃安万胜乡的汪治蘭，繙不起租，耕牛被地主夺去了，逼得上吊自杀，不少的农民被地主剝削得无法养活自己的小孩，往往便忍心地把初生的小女孩溺死。

工人（手工业工人、碼頭工人、店員工人）也和农民一样，过着极端悲慘的生活。工人的劳动時間很长，清早起来做到天黑，一天工作十二三小时，老闆为了賺錢还要加班加点，工人是沒有星期天休息的，只有年节才放几天假，工人的工資很低，劳动力强技术高的才勉强維持两个人的生活，劳动力較弱技术較差的只能維持自己个人的生活，女工的工資就更低了。学徒是三年沒有工資的，第四年是幫活，只領一般工人工資的二分之一。黃岡、廣濟等县的碼頭工人，还普遍受着封建把头的剝削，一般10%的工資都被把头夺去，新来的工人还要請把头喝酒，繳五、六块錢的进碼頭費。（据黃安、黃陂、黃岡等县調查材料綜合）

这样悲慘的生活，使鄂东人民日甚一日地感到无法生活下去了。因此，便紛紛起来进行反抗。

在軍閥豪紳地主殘暴統治时期，黃安、黃陂、孝感、黃岡、黃梅、圻春、英山等县，先后都有农民自发地起来向軍閥豪紳地主展开斗争，如一九二〇年腊月，圻春蔡受乡的农民，在木匠出身的蔡旺尔的领导下，組織了不少的农民，高举写着“蔡天順”的大紅旗，向土豪劣紳展开斗争，提出“劫富救貧”的口号，不准剝削階級抬高谷价来榨取农民。后来受軍伐的摧殘而失敗了。每当水旱天災歉收荒年的时候，地主便把囤积的粮食高价出卖或大量运输出境，攫取暴利。这样就使丰年也难得一飽的农民陷入极度飢饉的境地，除了起来反抗沒有别的出路了。因此，黃安、黃陂、英山、孝感等县农民都不断起来燒地主的房屋，打地主的谷仓，其中声势特別浩大的，就有英山县一千多飢民打大地主張清和谷仓的斗争。在一九一九年，黃梅县的大當舖（同心典），企图更殘酷地榨取人民血汗，便提高利率，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憤怒，因而便把同心典打了。

在城鎮中的工人也是一样，紛紛起来进行斗争。如一九二二年的端午节，黃陂叶义和的二十多个染織工人，在工人會作志的领导下，向資方提出加薪加餐的要求，并罢工一天进行斗争，最后資方不得不加薪10%，加餐一倍。（据黃岡、紅安、英山等县資料汇编綜合）

不断的自发斗争，有力地表明了鄂东劳动人民对于封建黑暗統治的反抗。但是这些自发斗争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就不可能有远大的政治目标，所以终于都失敗了。这証明了只有在工人階級的先鋒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推翻黑暗的統治，取得革命的胜利。

第四节 半殖民半封建性質的鄂东文化

由于帝国主义、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的殘酷压迫和剝削，使鄂东广大的劳动人民穷困不堪，受教育的权利全被剝夺，加上統治階級用毒辣的迷信来麻痺人民的思想。因此，造成鄂东文化极为落后。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的鄂东，由于广大劳动人民受着无穷无尽的剥削敲榨，使文化非常落后，尤其是山区就更为落后了。如黄安文盲就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高桥萧家湾，全村有三十多户，识字的只有二人。全县只有城关一所高级小学和其他乡村中有几所初级小学外，其余都还是私塾，教书的多为五、六十岁的八股先生，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旧东西，灌输三纲五常、孔孟之道的封建思想。那时能上学读书的十之七八都是剥削阶级的子弟，到外地读书的就更不用说了。纵有个别贫苦子弟苦于求学，但往往被生活所迫，而读个一年半载就不得不中途停学了。

婚姻方面，仍处在封建的包办买卖的婚姻制度中，养童养媳的现象非常普遍，青年男女对自己的婚姻大事是无权过问的，往往造成投塘上吊的惨事。

狡猾阴险的统治阶级还用毒辣的迷信手段来麻痹人民的思想，当时鄂东各地寺庙很多，和尚、尼姑、道人等讲神说鬼来欺骗人民。

不仅如此，而且还有披着传教士外衣的侵略者、恶毒地用设教堂、办学校和各种所谓“慈善事业”的阴险手段，进行可耻的文化侵略，梦想消灭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心与革命性。

披着传教士外衣的英、美、法、德、意，西班牙等国的侵略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不仅侵入黄冈、黄梅、圻春、广济、浠水、英山等县的城关，而且还侵入到广大的乡村，甚至偏僻的山区，这些侵略者恶毒地通过办学校（如黄冈的懿范学校，广济的刊江中学）和办医院、育婴堂（如黄州的鄂东医院、广济的普爱医院和育婴堂）等所谓“慈善事业”，进行可耻的文化侵略。这些家伙毒辣阴险地宣传迷信，说什么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人要安分守己，甘受痛苦才能上天堂，梦想从精神上来奴役人民。而且可耻的传教士还直接干涉地方政治，强买民田民房，如英山县的教堂就强买民田四十多亩，进行收租剥削，黄冈的教堂，仅在汉川门外就强夺民房二十多间，传教士还横行乡里、调戏妇女，盗窃文物。

侵略者的罪恶活动，引起鄂东人民极端愤恨，洋人出门，鄂东的劳动人民就用石头揍这些家伙。当“五卅”惨案消息传到鄂东时，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慨，黄梅人民气愤地把教堂的耶稣象撕掉，广济“刊江中学”（教会学校）的学生，都纷纷退出学校，进行反帝宣传。（据红安、黄冈等县资料彙编综合）

第二章 五四运动的影响，馬列主义的传播， 党組織在鄂东的建立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二四年)

第一節 五四运动的影响，馬列主义的傳播：

在世界无产階級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下，在列宁的号召下，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了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六月三日运动的主力由学生羣众轉到工人階級的身上以后，工人的罢工斗争大大地鼓舞了各阶层人民斗争的勇气，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便迅速地席捲了全国。武汉的工人，学生也和全国其他大城市一样，展开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武汉学习的鄂东各县知識青年，也紛紛回到各县，热烈地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傳活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鄂东各县到武汉讀書的学生，如黃岡的陈潭秋、林毓南、林毓英、陈蔭林、林洛甫、胡亮銀、刘艺祖、萧云骨、陈学渭等，黃陂的唐际盛、乐景鐘、胡业裕、卢斌、林茂祥等，黃梅的宛希儼、吳鉄汉、李子芬、王一飞等，他們都直接参加了武汉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而且他們其中不少就是运动的領導干部。六月間，他們与湖北各地的青年学生一起，在陈潭秋、恽代英、林毓南等的領導組織下，成立了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从而湖北省的知識青年、学生在它的领导下，就更有組織，更蓬勃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宣傳活动。

一九一九年暑假，鄂东各县在武汉讀書的返乡学生，在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的布置下，在黃岡、黃梅、黃陂、圻春等县，发动了当地的知識青年和高小学生，在城關或集鎮，召开了羣众大会、举行了遊行示威，他們高呼：“外爭国权，内惩国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爭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賊曹汝霖”、“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貨”、“不坐日本船”等口号。并且还組織演講队，搭台演講，演文明戏，向羣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傳。在黃岡的八斗灣小学，黑板上还写着“同学们，我們不要忘記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我青島！”的大字，每到放学时，老师就叫学生齐声唸一遍。在团风还发起了檢查、燒毀日貨的运动。与此同时，黃梅县到武汉、上海、南京等地讀書的学生，为了更好地进行宣傳活动，还組織了“黃梅旅外学生会”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傳。

在进行反帝宣傳的同时，他們还向人民揭发軍閥政府的昏庸腐朽和卖国的罪行，并号召人民不要信迷信。

由学生們所組織的反帝反封建的宣傳活动，一方面得到了鄂东广大劳动人民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支持。使人民受到了深刻的革命教育，更激起了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視、对軍閥政府

的痛恨！大大促进了鄂东人民的觉醒。另一方面参加爱国宣传的知识青年本身也受了一次锻炼和教育。这样就为马列主义在鄂东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综合自黄冈、黄陂、黄梅等县革命史资料彙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我国有了广泛的传播，影响了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倾向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在各大城市里都纷纷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的团体，尤其是一九二〇年夏，在董必武同志领导下的武汉共产小组成立后，对鄂东马列主义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间，在先进知识分子恽代英、林毓南等的领导下，在武昌组织了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的“利羣书社”，并出版了小报“我们的”，进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革命书刊，开展新文化运动，而且与国家主义派等，展开了思想斗争。因而，利羣书社便成了长江上、中游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之一。鄂东各县不少的知识青年，就是该社的主要成员，如黄冈的林毓英、林洛甫、李求实、陈学渭、黄陂的唐际盛、乐景钟、胡业裕等，他们对马列主义在鄂东的传播起了良好的桥梁作用。

一九二〇年夏，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在武汉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一九二〇年的下半年，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陈潭秋、林毓南等在黄冈便成立了“黄冈马列主义研究小组”，这是鄂东建立最早，最先进的团体，它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有着密切的联系，小组的领导人就是陈潭秋和林毓南，组员有林毓英、刘艺祖、陈蔭林、林洛甫、胡亮银、萧云骨、陈学渭等人，他们都是黄冈到武汉读书的学生，其中很多就是利羣书社的成员。他们进行了有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介绍马、恩、列的生平和革命活动，并讨论当时现实社会的陈败腐朽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他们订阅了“新青年”“觉悟”“少年中国”等进步杂志。到一九二一年初，他们便在黄冈的八斗湾创办了“濬新小学”，在陈宅楼，杨鵬岭创办了“聚新小学”和“青黎小学”。通过这些学校进行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军阀政府的昏庸腐朽。

在他们创办的这些学校中，招收贫苦农民子弟入学，男女兼收，特别是“濬新小学”的教学形式和内容都是新的，师生还参加劳动，争取经费自给，反对读四书五经，提倡白话文，国文教材多是由老师（是利羣书社黄冈马列主义研究小组的成员）自编，内容是反映当地的社会经济，揭露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军伐政府的腐败，讲解农民贫困的原因；历史课便是“借历史了解以前社会，批评现实社会，推演将来社会”“把历史课当作引导学生信仰我们所抱主义的工具”；音乐课唱的歌曲也多是老师自编的，甚至算数课也不只是单纯的加减乘除，而是结合揭露豪绅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这些学校不仅有日班，而且晚上还开办妇女识字班和农民夜校，一方面教他们读书识字灌输革命思想，另一方面也和群众取得一定的联系。

随后，一九二一年恽代英等同志，便组织了“互助社”，并在启黄中学（鄂东学生很多在该校读书）建立了分支——“人社”，这是一个以开展新文化运动为宗旨的进步组织，成员多为鄂东各县的学生，如黄梅的宛希儼、吴铁汉。同年夏天，恽代英同志又在黄冈成立了“共存社”，黄冈、黄陂等县利羣书社的成员，大多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开成立大会时，毛泽东同志主办的长沙文化书社还派了代表参加。大会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苏俄，赞